

党章视域下党的基层组织的历史演进研究

■ 李闯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在党内具有最高权威性。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在社会基层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组织。党章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有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之日起,就把组织建设作为自身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来抓。从党章视域分析,党的基层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特征。建党初期(1921—1927年),基层组织的核心是党小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层组织的核心是党支部;改革开放新时期,基层组织的核心是党支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层组织的核心是党支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组织建设的论述构成了对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实践发展新成果。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必须以党章为依据,以坚持和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为根本原则,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为根本路径,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不断推动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党章;基层组织;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

一、引言

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党执政大厦的“神经末梢”,其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党的战斗力与执政根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组织建设作为自身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有明确规定,并随着历史演进不断修订和完善。本研究旨在通过党章的视角,揭示党的基层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和演变规律。从二大党章首次提出“三人成组”,到四大确立“支部为党的基本组织”,再到新时代党章修正案增写“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章始终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制度导航仪”。

本文以历部党章的修改为视角,归纳总结基层党组织的演进历程,总结其中蕴含的经验启示,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把握,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加强自

身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永葆党的肌体健康意义重大。

二、建党初期(1921—1927年):小组制探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起初并未明确提出“基层党组织体系建设”这一概念。这时期,党的基层组织主要经历了由“组”到“支部”的转变,并且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基本原则开始初步确立。[1]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首次以党章形式确立了基层组织的雏形。[2]这一时期的基层组织以“小组”为基本单位,其组织形式高度秘密化,强调集中统一领导,以适应地下斗争与革命动员的迫切需求。二大党章要求党员“严守党的秘密”,且小组需直接接受上级组织指令,凸显在军阀割据与白色恐怖背景下,党组织通过分散化、灵活化的结构保障生存与行动能力的战略考量。

三、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年):支部建在连上

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关键转型阶段。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与党内力量的分散化困境,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原则,并于1928年六大党章中正式确立为党的基本制度。[3]这一制度设计不仅解决了早期党组织与武装力量脱节的问题,更通过层级化的组织网络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基层组织成为革命斗争的“神经中枢”。六大党章对支部的职能界定具有鲜明的革命导向。其规定“支部必须与群众密切结合”,要求党员“深入群众宣传党的主张”。[4]

四、全民族抗战时期(1937—1945年):“三三制”实践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需求,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创造性推行“三三制”政策。“三三制”作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毛泽东于1940年3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首次明确提出来的。[5]这一制度既确保了党的领导核心地

位,又通过吸纳党外进步力量参与政权建设,实现了政治整合与社会动员的双重目标。1945年七大党章明确提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基层组织“团结各阶层群众”,为“三三制”实践提供了制度依据。[4]在具体操作中,根据地基层政权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代表,严格遵循“三三制”比例。[5]

五、新中国成立后(1956—1978年):单位制党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城市基层社会逐步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基层地区管理“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6]1956年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按生产单位、工作单位来组织”,将基层党组织与工厂、机关、学校等社会单元深度绑定,形成“单位制党建”的独特体系。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将党的组织网络嵌入国家行政体系与社会生产领域,通过“党政合一”的治理结构,实现政治动员、社会管理与经济建设的有机统一。单位制党建不仅是党组织覆盖全社会的制度保障,更成为国家政权渗透基层的关键纽带。

六、改革开放时期(1978—2012年):多元组织形态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市场经济转型与社会结构多元化趋势,推动基层组织形态从“单位制”向“多元化”转型。这一阶段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十二大党章为起点,明确提出“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等基层单位成立党组织”,[4]并首次允许在“新经济组织”中建立党支部,标志着基层组织突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框架,向非公经济、新兴领域及流动人口覆盖。1992年,十四大党章进一步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了给多元组织形态的探索提供制度空间,要求“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调整组织设置”。[4]

七、新时代(2012至今):网格化党建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城市化加速、社会流动性增强与治理复杂性上升的挑战,创新性提出并全面推行“网格化党建”模式,将其作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建设好党的组织体系这座大厦,要让组织体系的经脉气血畅通

起来。[7]十九大党章明确提出“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要求“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为网格化党建提供了制度依据。这一模式以“党建引领、网格覆盖、精细服务”为核心逻辑,通过重构基层治理单元、整合多元主体资源,实现了党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深度嵌入与高效动员。

网格化党建的实践基础源于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敏锐回应。随着传统单位制解体与人口流动加剧,城市社区成为基层治理的主战场。党组织将社区划分为若干网格,每个网格设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形成“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四级组织架构。[8]网格化党建是党对基层组织功能定位的又一次战略性升级。十九大党章强调“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9]赋予基层党组织在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这一规定将网格化党建从技术性工具上升为制度性安排,要求党组织在资源分配、矛盾调解、公共服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在疫情防控中,网格党组织通过“党员包户”“数据追踪”等方式,成为社区防控的中坚力量,充分体现了“平战结合”的治理效能。

网格化党建标志着基层党组织从“管理执行者”向“治理引领者”的转型。相较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多元组织形态”,网格化党建更强调系统性整合与数字化转型,通过组织下沉、技术赋能与群众参与,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治理网络。[10]这一模式既延续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优势,又创新了数字化时代的治理工具,为破解基层治理“碎片化”“空心化”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新时代网格化党建的探索,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问题导向”的改革方法论。[11]它不仅是基层组织形态的革新,更是党通过制度韧性适应复杂治理环境的生动体现,为全球基层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未来,随着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深入,网格化党建需进一步强化数据驱动、跨界协同与人文关怀,推动基层治理从“高效能”向“高质量”跃升。

八、结语

以党章为视角,梳理建党以来党的基层组织的演变历程后可以清晰发现,从成立之初的五十余名先驱者,到如今汇聚近亿成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书写了政党发展的壮丽史诗。而在这个发展奇迹的背后,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组织体系的精心设计、不断完善和持续建设。特别是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党的组织体系愈加严密,基层党组织建设提质增效,党的执政根基不断巩固。[12]

参考文献:

- [1] 郭嘉晟,卢震.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体系建设的百年历史演进与新时代的行动方略[J]. 大连干部学刊,2021,37(07):29-35.
 - [2] 李志清.抗战时期基层党组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价值意蕴、基本经验与现实启示[J]. 理论建设,2022,38(04):68-75.
 - [3] 李宁,钟颖.“支部建在连上”凝聚基层党建力量[J]. 当代广西,2023,(16):57.
 - [4] 中国共产党章程[M].人民出版社,2017.
 - [5] 陈先初.从三三制看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J]. 求索,2005,(10):192-196.
 - [6] 何海兵.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J]. 管理世界,2003,(06):52-62.
 - [7]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8] 张志晓. 增强城市基层党建整体效应[J]. 共产党员(河北),2024,(17):49.
 - [9] 刘遵伦.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模式创新[J]. 党政论坛,2009,(06):34-36.
 - [10] 奉贤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建服务新体系[J].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09):66.
 - [11] 姜淑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 [J]. 党的文献,2016,(06):20-26.
 - [12] 黄志高.党章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的历史演进和创新发展[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4,17(02):109-117.
-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双循环格局下产业园区开发企业向产业投资商转型的生态构建研究

■ 宋安

在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产业园区的开发正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传统的园区开发模式已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亟待向更高层次的产业投资模式转变。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催生的新兴产业,为开发商提供了新的投资和盈利空间。因此,产业园区开发企业向产业投资商的转型成为一种趋势,有助于提升园区的产业层次和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明确战略定位,为转型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产业园区开发企业必须明确其战略定位,确立转型的方向与目标。通过对现有资源的系统梳理与整合,企业能够识别其核心竞争力及潜在的增长点,为企业双循环转型提供坚实的支持。关键在于:深入分析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趋势,以确保转型方向的前瞻性和可行性;结合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人力资源和技术实力等要素,以确保转型目标的实现可能性。

深入了解当前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新兴技术

产业园区开发企业需深入探究产业发展趋势及新兴技术特征,以精确判定未来投资方向与市场需求。既要兼顾国内市场动态与全球产业发展趋势,通过参与行业论坛、技术研讨会等获取最新产业资讯与技术动态,又要与业界专家进行深度交流,以不断提升认知水平与决策能力。此外,企业还应强化与科研机构、高等教育机构等创新主体的合作,共同推进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推动新兴技术的快速应用,加速双循环格局下的产业化进程。

强化多种形式参与产业园运营与管理

通过股权投资、管理输出、服务赋能等多种形式深度参与产业园运营与管理,可进一步提升产业园区的竞争力。具体而言:结合园区经营实际,深度融入日常运营,获取市场数据与信息,为未来的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与园内企业构建紧密联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推动产业的发展与升级。这一过程中,企业需

不断提升自身的运营能力和管理水平,为未来的双循环转型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加强与政府、高校、科研机构的沟通与协作

首先,产业园区开发企业需主动与政府部门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参与政府的产业规划与政策制定过程,深入理解政府的产业发展导向及支持政策,以期获得更丰富的政策支持与资源倾斜。其次,产业园区开发企业需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架构,引入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力量与人才资源,共同进行技术研发与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最后,产业园区开发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能够获取最新的科研成果与技术进展,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持续的动力。多方合作机制的形成有助于构建一个优良的创新生态系统,推动产业园区开发企业向产业投资商的顺利转型。

(作者单位:济南城市发展集团乡村振兴公司有限公司)



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在国有企业纪律教育中的实践路径

■ 牛玉君

摘要: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对国有企业纪律教育意义重大。本文深入探讨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在国企纪律教育中的实践路径,阐述该理论对于国企纪律教育的重要性,从理论根基、价值导向、组织效能等多维度剖析,凸显其关键地位;继而提出应用策略,包括构建教育体系、丰富教育方式、强化监督机制等。通过这些探讨,本文旨在助力国有企业有效开展纪律教育,提升内部治理水平,推动国有企业健康、持续发展,使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好地发挥支柱作用。

关键词: 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国有企业;纪律教育

引言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将党的自我革命理论融入国有企业纪律教育体系,既是深化国企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结合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必要性,深入探究自我革命理论在国企纪律教育中的实践路径。

一、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在国有企业纪律教育中的重要性

(一)筑牢思想根基,强化纪律意识

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此内涵为国有企业纪律教育构筑起坚实的思想指引。在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思想观念呈现出多元且复杂的态势,部分员工容易遭受不良思潮的侵蚀,从而纪律意识较为淡薄。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着重强调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以及自我提高,这一理论促使国企员工对自身行为展开深刻的反思。当员工深入研习这一理论时,能够明确地认识到纪律所具有的严肃性,进而从思想的根源之处加强对纪律的敬畏之感。例如,企业可定期举办专题学习课程研讨,对自我革命理论当中涉及纪律要求的内容进行系统解读,引导员工将纪律要求转化为自觉的行动,让纪律意识渗透日常工作的各个环节,从而从根本上防止违规违纪行为的出现。

(二)明确价值导向,规范行为准则

国有企业承担着经济责任、政治责任以及社会责任,其行为必须与正确的价值导向相契合。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为国有企业纪律教育明确了价值坐标,它要求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秉持廉洁奉公、诚实守信以及服务社会等价值理念。这一要求让国有企业的员工在工作当中拥有了清晰的行为参照标准,使其能够明确哪些行为符合纪律规范与企业价值观,而哪些行为是被坚决禁止的。例如,在项目招投标的情境下,纪律教育以自我革命理论为依据,能够使参与人员深刻认识到公平、公正、公开

原则的重要意义。这有助于从源头上防止暗箱操作、利益输送等违规行为的发生,进而确保项目招投标进程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如此,企业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得以维护,企业整体运营秩序也能够得到有效规范。

(三)提升组织效能,增强内部凝聚力

有效的纪律教育使国有企业的组织效能获得提升,而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为达成这一目标给予强大动力。在企业内部范畴,纪律是组织得以有序运转的保障。当员工对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展开深入理解且将其融入日常工作纪律这一行为之际,企业内部的沟通协作将会呈现更为顺畅。各部门之间拥有打破壁垒之能力,遵循统一的纪律要求以及工作规范来开展工作,以减少推诿扯皮之类的现象发生。同时,良好的纪律氛围能够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形成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举例而言,在企业面临重大项目攻坚的情境下,基于自我革命理论所进行的纪律教育可促使员工将思想汇聚一处、将力量集合一处,将高度的纪律性和责任感投身于工作之中,实现工作效率的提高,助力企业达成战略目标。

二、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在国有企业纪律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一)构建完善教育体系,夯实纪律教育基础

具备系统性与规范性的教育体系,是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在国有企业纪律教育领域实现

有效应用所依托的基础性条件。国有企业理应依据自身实际状况,拟定具备科学性与合理性的纪律教育规划。首先,清晰界定教育目标,将促使员工纪律意识获得提升、达成员工行为的规范化、营造出清正廉洁的企业氛围等作为具体设定的目标。其次,对教育内容进行扩充,除党纪法规以及企业规章制度之外,深入挖掘党的自我革命理论蕴含的精神实质,并将其融入各个教育模块当中。

(二)丰富教育方式方法,增强纪律教育吸引力

单一的教育方式难以达成满足员工多样化学习需求的状况,且对提升纪律教育效果而言处于不利境地。国有企业理应积极探寻丰富多样的教育方式,以达成增强纪律教育吸引力的目的。一方面,运用案例教学法,选择典型的违纪违法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使员工从真实案例当中汲取教训,对违反纪律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形成深刻认识。另一方面,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展开线上教育,开发在线学习课程、设置纪律知识问答互动等,增添学习的趣味性以及互动性,促使员工于轻松愉悦之氛围当中接受纪律教育。

(三)强化监督考核机制,保障纪律教育成效

国有企业应构建完善的监督考核体系,强化纪律教育全过程监督,有力有效地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教育进程期间,定期有针对性

性地组织开展情况实施检查,以保障教育计划按照时间节点加以推进,教育内容得以落实到相应位置。与此同时,强化针对员工学习状况的考核,通过考试形式、撰写心得体会、开展知识竞赛等,对员工关于纪律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行检验。将纪律教育考核结果与员工的绩效评估事项、职务晋升事宜、评先评优事项等加以关联,对考核成绩优异的员工给予奖励,对考核未达标的员工实施补考或者重新开展培训,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结语

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对于国有企业纪律教育意义非凡。其在重要性层面筑牢思想、明确导向、提升效能;应用策略包括构建体系、丰富方式、强化监督。通过多维度实践,助力国企提升纪律教育水平,完善内部治理,以严明纪律推动企业稳健前行,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李蕉. 大历史观视域下对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三维辩证[J]. 社会科学辑刊,2024(2):46-52.
 - [2] 李旭. 国有企业纪律教育向基层延伸的策略与实施模式探索[J]. 中国航班,2024(18):189-191.
- (作者单位:天津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